

周恩来听出章含之翻译中的一个讹误

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,很少有人谈到周恩来的英语水平。那么,周恩来的英语水平到底如何呢?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这样说:“他讲英语有点迟缓,但相当准确。”美国著名作家、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则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——在一个苏联人举办的酒会上,周恩来用英文致辞。而周恩来本人在会见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欧文·拉铁摩尔时,则说“我的英文程度有限,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”。

就是用这“有限”的英语,周恩来发现了章含之翻译中的一个不小讹误……



周恩来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尼克松

英语底子好曾想报考英国学校

1913年春,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,在大洋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,此后考取南开学校。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,学制四年,相当于中等学校。主科有国文、英文、数学(包括代数、几何、三角)三门,每年都有,英文课每周有十小时。从二年级起,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,各科都用英文课本;三年级起,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。

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,获国文最佳奖,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,以平均分89.72分的成绩毕业。《毕业同学录》中这样评价周恩来:“君家贫,处境最艰,学费时不济,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”“善演说,能文章,工行书”“长于数学”“毕业成绩仍属最优”。

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,但是既然毕业成绩“最优”,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。

1918年4月周恩来留日

期间的日记写道:“阅英文报,得知……”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,却阅读英文报纸,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。

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,曾专门跑到英国,打算报考英国学校,可见,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。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。

离开上海后5年没有机会说英语

1936年6月,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(Edgar snow)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。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第二篇“去红都的道路”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: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,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。他走上前来,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:“哈喽,你想找什么人吗?”他是用英语讲的!我马上知道他就是周恩来。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,一边颇感兴趣地观察着他,因为在中国,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,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。他个子清瘦,中等身材,骨骼小而结实,尽管胡

子又长又黑,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,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。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,似乎是羞怯、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物。他讲英语有点迟缓,但相当准确。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,这使我感到惊讶……

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“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”呢?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,回团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,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。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,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,周恩来的确近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。

欧文·拉铁摩尔(Owen Lattimore)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,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,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,前往重庆,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。在此期间,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,包括周恩来。拉铁摩尔在《中国回忆录》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。他这样写道: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,是只身一人,连个

翻译都没带。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(音)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,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。我们忆起的六大以后,回团在上海坚持的印象,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。忽然间我想起周一一直在学习英语,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。于是我问:“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?”“噢,对不起,”他说,“我的英文程度有限,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,还是用中文吧。”我答道:“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,我讲得也不怎么好,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。”他说没有问题。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……

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,到了1941年却因为“英文程度”有限,而使用中文与美国入交谈,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,但还没有到“差不多忘光了”的地步。

苏联人的酒会上用英语致辞

美国著名作家、记者哈里

森·索尔兹伯里(Harrison Salisbury)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。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,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。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、米高扬、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,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,包括英国和印度。当周恩来致辞时,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。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,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,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,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。

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,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,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:“周,你为什么不说俄语,你的俄语很流利嘛!”周恩来的回答是:“你怎么不说中文呢?”

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。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·H·怀特(Theodore H. White),中文名字叫白修德。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-40年代美国《时代》杂志驻华记者,与周恩来相识。

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,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,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,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。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,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,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。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有限,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“old friend, old friend”。

发现章含之少翻译了一个零

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,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。基辛格博士在《白宫岁月》这本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周恩来,他脸容瘦削,颇带憔悴,但神采奕奕,双目炯炯,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,既谨慎又满怀信心……他听英语时,不必等到翻译,脸上的笑容和

表示理解的表情,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;他警觉性极高,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到……

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·黑格(Alexander Haig)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“the U.S.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”,章含之翻译为“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”。章含之注意到翻译过来后,周恩来没说话,但显然皱了眉头。

黑格走了以后,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、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。查了之后确实是“生存能力”的意思,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,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,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,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“生存能力”。

尽管发生了“viability”的小插曲,黑格的打前站还是非常成功,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。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,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,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章含之说她很出色,“翻译我全听到了,一个字也没错过。”

尼克松当然不知道,就是在这次酒会上,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译错了一个词,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,才1.7万英里,当时他说的1.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,章含之将它翻译成1700英里。

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出来,因为那时到场的其他中国人没有人去过美国;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出来,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,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,他抬起头来说:“含之,太近了点吧。” 谢绝转载,上网 翟华/文 据《文史博览》

大款挥泪别二奶 捐物竟是海洛因

2月8日,攀枝花开往隆昌的特快列车在资中站刚一靠站,3名便衣民警就冲向5号卧铺车厢。周丹的脚还没有踩着站台就被一名女干警擒住肩部,一头雾水的她惊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周丹随同3名便衣民警来到资中禁毒大队,民警从她身上搜出一包白色粉末,经化验,这是一包多达530克、纯度达91%的毒品海洛因。在警方的讯问下,周丹讲述了身上这包“胃药”的来历……

早恋苦果使她离开学校

周丹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,父亲就准备好纸、笔、饭等东西让她去抓,小小的她紧紧攥住一支笔不愿放开。父亲开心极了,说女儿将来肯定是块读书的材料。果然,从小学到初中周丹都是班上的第一名,这可真真乐坏了父母。

周丹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,所以不管她的学习成绩有多优秀,在学校有多引人注目,她的物质生活都是相对清贫的。周丹上了高中以后,班上有个厂长的儿子叫田昶,因为家里有钱,总是穿着班上最昂贵的衣服,用着最好的文具,吃着最好的一日三餐。田昶人长

得很帅气。出于女孩子的羡慕虚荣心理,在田昶频频向自己发出邀请后,周丹开始与他约会。两人频频下馆子、上影院。由于耽误了大量课程,周丹的成绩迅速滑坡,引起了老师的注意。老师经过调查发现她与田昶恋爱的事,学校决定对她记过一次并发出严重警告。经过这件事情,周丹觉得自己深受委屈很没面子,一气之下于1999年5月离开了校园。

从学校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里,周丹几乎天天都去应聘,可都因为文凭太低被拒之门外。万般无奈的情况下,她向父母要来两万元,在一家精品城租来一个摊位,每天起早摸黑,累得身心疲惫还是只能勉强维持经营而已。周丹的难处被在精品城门口经营海鲜的老板欧阳程辉看在眼里。欧阳程辉比周丹大12岁,是一个貌不惊人却腰缠万贯的广州商人,在资中各县都开有分店。自从周丹到精品城做生意后,欧阳程辉就经常到周丹的摊位上走动,有时主动给周丹讲一些经营经验,分担她生意的风险和没有生意时的寂寞。

被人包养遭到弟弟疏远

2000年7月的一天,欧阳程辉说要给朋友买一套衣服,不知该买什么样的衣服能让女孩子满意,特来请教周丹

并请她去专卖店帮他试衣服。碍于平时的交往,周丹不好拒绝就去了。让她没有想到的是,在回来的车上,欧阳程辉竟给了她1000元钱说是酬金。半个月后的一天,欧阳程辉又对周丹说,他的一位合作伙伴从北海过来,想请周丹作陪共进晚餐。因为平常欧阳总照顾周丹的生意和头次试衣服的钱的引诱,周丹再次答应前往。那晚,周丹见识了欧阳程辉的豪爽和阔气。欧阳在客户面前称周丹是他的未婚妻,因为周丹与他配合默契,他很满意。客人走后,欧阳程辉高兴地给了周丹3000元的酬金。

后来,周丹了解到:欧阳程辉早已经结婚,妻子到日本留学去了,为了消遣寂寞,他交往了许多女孩子,但都是钱与色的交易,一直没有付出真情。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,周丹开始动起了心思,她想,如果真的与欧阳程辉有了关系,就不必再为生意焦头烂额、四处奔波了,也就有了坚实的靠山。如果将来两人的感情到位了,欧阳程辉说不定会与妻子离婚,自己还有“转正”的那一天。虚荣心战胜了理智,周丹开始主动接近欧阳程辉,两人很快建立了情人关系。

欧阳程辉非常喜欢年轻漂亮的周丹,生怕她离开自己。为了使周丹高兴,他主动为周丹

装修了店面,还聘请人为她照顾店里的生意,频频为她买各种高档名牌衣服和装饰品。为周丹在家人和亲属面前有面子,欧阳程辉还按照传统礼仪给周丹的父母送去了巨额彩礼,还在资中最高档的酒店举行晚宴,让周丹所有的亲属、朋友、以前的同学都来参加,为她捞足了面子。然而,生活总是真实而平淡的,不可能总在浪漫中度过,随着同居生活的开始,彼此的缺点都显露出来。欧阳程辉是个很狭隘的男人,他不许周丹穿高跟鞋,原因是周丹的个子本来已经比他高了;穿衣服要经他过目,不得过于新潮和鲜艳,说是周丹本来已经很漂亮了,如果更漂亮让他心里犯愁。周丹非常理解欧阳程辉的做法,觉得是他太爱自己,生怕自己从他身边被人掠走,才如此小心眼的。

2003年7月,周丹的弟弟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。欧阳程辉给周丹弟弟买了许多高档的生活和学习用品,还为他买好了6张飞机票,要周丹全家送弟弟去北京。可是,这一切都被弟弟拒绝了,他只身背着简单的行李去了北京。周丹反复向弟弟追问原因,弟弟终于告诉她:他觉得那些钱不够“干净”。弟弟的言辞让周丹深受震撼,她知道自己在许多人眼里都只是一只金丝鸟,就是再华贵,也

都是一只别人的宠物而已。周丹开始正视自己的未来:给人当“二奶”能长久吗?能幸福吗?有了这种想法之后,周丹开始留意为自己存钱,她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离开欧阳程辉。

然而,面对欧阳程辉,想到他对自己的好,周丹总是觉得开不了口,分手的事情一拖再拖,慢慢地,欧阳程辉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。

离开情人险些被栽赃

2008年1月2日,周丹终于把分手的想法告诉了欧阳程辉,欧阳程辉当时就哭了。经过周丹再三要求和反复说理,欧阳程辉在两天后终于答应分手,并说把以前他们俩买来同居的房子、汽车都给周丹,但是在分手之前,希望周丹能陪他去云南西双版纳旅游一次,作为这场感情的永久纪念。周丹大为感动,答应一同前往西双版纳。到了西双版纳风景区,欧阳程辉和周丹一直都很开心。

当他们准备返回四川时,欧阳程辉提出坐飞机先到昆明,再转车到攀枝花,然后搭攀枝花开往隆昌的特快列车,到四川资中站下车后,两人就彻底告别。欧阳程辉还说,这样不仅可以与周丹多呆几天时间,另外,他有点药瘾在攀枝花朋友那里,正好顺便带回去。见眼前

的男人如此情深义重,周丹一口答应了他规划的线路。

两人到攀枝花后,欧阳程辉突然说他生意上有些事情需要与朋友商谈,要用两天时间,他让周丹先上车回资中。他提出让周丹顺便先将药替他带回去,等他回到资中后再找人去拿。周丹临走前,欧阳程辉又说,他不忍心与心爱的分手,所以就不去火车站送别了。就这样,周丹独自一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欧阳程辉的一包“治疗胃病的藏药”踏上了列车。

2月8日,车到资中站,周丹刚在车门口出现就被3名禁毒民警拦住,她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,长期以来,欧阳程辉一直利用生意作掩护,长期在资阳、成都、资中、内江等地进行贩卖毒品的非法活动,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民警的监视下。这次,民警料定欧阳程辉一定会带毒品,然而,在临上火车前,欧阳程辉却失踪了。民警于是锁定了他的同伴周丹,果然,在周丹身上发现了毒品。

3月17日下午16时37分,在攀枝花组织又一批海洛因的欧阳程辉在进行毒品交易时,被民警逮了一个正着,听到这个消息,周丹惊出一身大汗,原来自己一直与狼共舞,竟丝毫未觉。

(本文除欧阳程辉外均为化名) 袁理/文